

丝绸之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法〕阿里·玛扎海里 著 耿昇 译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中华书局

•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

丝 绸 之 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法〕阿里·玛扎海里著

耿 昇 译

中 华 书 局

LA ROUTE DE LA SOIE

ALY MAZAHÉRI

S. P. A. G. (PAPYRUS)

Paris 1983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丝 绸 之 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法〕阿里·玛扎海里著

耿 昇 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兴校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9 $\frac{1}{4}$ 印张· 429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6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501— 3500册 定价:34.00元

ISBN 7— 101— 01123— 3/K· 467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前言

法国学术界,对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与当年的世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在十八世纪中叶,就有耶稣会士及少数学者开始了这一事业,注意介绍中国历史、民族史、佛教文化史等。自此以后,可以说是代有人出。进入十九世纪,作为研究汉学的一个基地,1914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中国学讲座”。雷慕沙(Abel Rémusat)、儒莲(Stanislas Julien)、德理文(H. de Saint-Denys)、沙畹(Edward Chavannes)这些汉学名家都曾是它的主持人,在他们的研究中,西域的民族、历史、宗教是注意的重点。因沙畹的汉学造诣,斯坦因在新疆考古中所获部分汉文资料就曾委托他进行研究考释,他的《西突厥史料》一书,至今仍是我国历史学界重视的研究成果。

在法国研究汉学的事业中,设在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也是一个重要基地。沙畹的弟子马伯乐(Henri Maspero)、作为法国在我国西域史研究方面代表人物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均曾任职于法兰西远东学院,并从这里出发进入中国进行活动。伯希和1906—1908年在我国西北地区考察中,不仅在新疆巴楚的吐木休克、托库孜萨来,库车的都勒杜尔—阿胡尔、苏巴什进行了发掘,拿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而且在敦煌莫高窟,贿买愚昧无知的王道士,打开藏经洞,用数十天之功,对藏经洞内的文书进行详细记录,并捆载其中的精华以去。伯希和以其特有的汉学造诣,多方面的语

言才能,凭藉在新疆、甘肃的考察收获,获得了空前的荣誉。法兰西学院为其专设了“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他完成了大量有关中亚史地、语言、民族、宗教的论著。法国成为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心,是与这一背景有关的。继伯希和以后,列维(Sylvain Levi)、高狄奥(Rebert Edmond Gauthiot)、费琅(Gabriel Ferrand)、格鲁塞(René Grousset)、韩百诗(Louis Hambis)等,也都是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中取得过成就的汉学家。继承着这一传统,不论从欧洲,还是从世界范围看,法国巴黎至今仍然是一个国际上的重要汉学研究中心。

法国学者在中国西部研究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他们译注了我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关系古代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献资料、高僧行记,向欧洲进行介绍。这种翻译往往运用汉文、蒙古文、突厥文、波斯文、拉丁文及其他古代语言文字资料,进行综合考释,从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在敦煌研究上,法国汉学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伯希和在敦煌期间,对石窟进行了编号,绘制了遗址图,对洞窟作了考察、记录,对窟内题记详细抄录,对壁画彩塑作了断代分析。他拍摄的洞窟壁画、彩塑,编辑出版了《敦煌壁画》六卷,他当年的考察笔记,也已作为《伯希和探险团档案》陆续出版,具有重要资料、研究价值。在“藏经洞”及其他遗址中取走的大量古代文献,也分别由伯希和委托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研究,费利奥扎和鲍利负责梵文,拉露负责藏文,贝利负责于阗文,列维等负责龟兹文,高狄奥和邦文尼斯特负责粟特文,哈密顿负责突厥回鹘文,有关成果也已陆续出版。伯希和在敦煌的活动大家一般都有了解,而对伯希和当年在新疆巴楚、库车县的发掘,了解却不甚多。在吐木休克、苏巴什、都勒杜尔·阿胡尔等处遗址中的出土文物,大都收存在吉美博物馆,文书资料收存在巴黎图书馆的东方手卷部,工作报告也已陆续

出版问世。这些重要资料,无疑都是我们研究中亚、新疆、敦煌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对今天的研究都有价值,是不能忽视的。当然,在当代法国汉学家中,也出现并还在完成着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引起我们的注意。附带还说一句,法国科研中心 315 研究组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十年中也一直进行着有意义的合作。目前,经中国政府批准,正在克里雅河流域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并已取得了虽是初步的、但却是很有价值的成果。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两国学者之间的科学合作,也可以说是中法两国学者在中亚研究的事业中正在展开的全新的一页。

能看到法文原版著作不易,即是有幸得到,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还存在一个文字上的困难,因此,向中国学术界陆续介绍法国学者过去在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古、历史、民族、宗教、语言等诸多领域研究成果的想法,萌发是很早的。张广达教授曾十分热情地支持这一设想,法国朋友也对这一计划给予肯定,希望有可能陆续将有关重要资料、研究译成中文出版。这一丛书的问世,可以说是中法两国学者友谊的结晶。但限于编者的学识、经验,在决定选题、组织翻译等环节中,尚欠缺更完善的计划。目前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计划原则确定、出版经费落实之后,选定的第一批著作。在翻译、出版中,得到了有关法国学者、出版社以及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积极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它们的出版,对我们了解法国学者在有关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今后进一步的翻译、出版工作中,我们希望得到有关学术界同仁的支持、帮助,也希望听到批评、建议,以便改进工作。

译者的话

法国当代著名东方学家阿里·玛扎海里先生的名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在各有关方面的帮助下，终于译成中文而在中国出版了。我衷心地希望出现在中国书林中的这棵小草，既能为促进中法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又能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伊朗以及丝绸之路沿途诸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也能为促进我国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

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éri, 1914—1991年)诞生于伊朗德黑兰，他早年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毕业后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后又于圣克卢高等师范学院毕业，获得了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毕业后曾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工作，后又在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和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社会学系执教，退休后曾生活在巴黎郊区的夏尔特尔(Chartres)古堡。他是一名多产的中亚史和穆斯林史学家，著作颇多，而且影响很大。他的许多著作都被译成了多种西方文字并多次重版。他1951年在巴黎哈切特出版社出版的《中世纪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为该社出版的一套近40种的各国和各个地区、各时代的日常生活丛书之一种)曾被翻译和再版了19次之多。他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朗家族》被他的业师巴黎大学文学系教授保罗·福科纳(Paul Fauconnet)誉为“远远超过了本系博士论文的一般水平”。他在1970年于《19世纪》杂志第5卷中发表的长文《伊斯兰世界》则对19世纪的伊斯兰

社会史作了高度概括,成了研究这一内容时必读的参考书。玛扎海里 1975 年出版的《论算术起源于波斯的文化史问题》、1973 年出版的《地下水的文明,论地下水的开发》等则表现了他在自然科学史领域中的造就。他于 1960 年在《社会和文化年鉴》第 5 期中的发表的《论杆秤起源于中国》一文中认为古代罗马人使用的杆秤以及后来由此发展起来的衡具都应追溯到其中国起源。他 1983 年在《美术学报》新编第 5 期中发表的《中国雕塑的魔怪起源》一文中认为中国最早的造型艺术与鬼怪有关,这一作法很早就传到了西方。他 1958 年在《社会和文化年鉴》第 4 期中发表了《刀对剑,论炼钢炉的中国起源》一文。他认为中国人最早会铸剑,中国的坩埚和铁匠炉是最早的熔炉雏形,后经丝绸之路传向西方。1980 年他在《交流杂志》中发表的《论中国壁画的空间》更是对于中西方艺术理论进行比较的名著。他认为虽然在当代的中国绘画中出现了西方影响,但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人的笔墨技巧以及他们评价空间的方式。此外,他对于波斯文学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论著也很多。由于他诞生和成长于“东方文化”的社会中,又深造和工作于典型的“西方文化”之背景中,所以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就更具新意,更为逼真,同时也就更为引人注目。《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是阿里·玛扎海里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作者 20 多年心血之硕果。这部巨著于 1983 年由巴黎的斯巴格(巴比鲁斯)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快被作者自己译作波斯文准备出版。

本书内容共分四编。第一编是《波斯史料》。作者在这一编中译注了 3 种古代波斯文著作:《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阿克伯的《中国志》以及《纳迪尔王和乾隆在中亚的较量》。作者把这 3 种有关中国和波斯之历史关系,特别是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文化关系的重要古波斯文著作译成法文并作了长篇注释。他在注释中提供的资

料价值可贵,其诠释又多具新颖观点。他对中国文化(也包括印度及中国周边地区的文化)经丝绸之路传到波斯并在波斯得以发展,然后又传向西方(特别是罗马)的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有许多观点是先人所未触及过的。原书的第二编为《汉文史料》、主要是对《汉书》、《后汉书》、《魏书》、《梁书》、《唐书》和《悟空行纪》中有关波斯的资料作了辑录和译注。考虑到本书篇幅很长,而且这一部分史料也是中国学者十分熟悉的。所以我在翻译时把这一编删去了。虽然作者自称他的诠释“与众不同”,对同时代的中国和波斯的历史、文化及社会作了深入比较。原书第三编即本书的第二编是《希腊-罗马史料》。作者对托勒密、普罗科波、泰奥法纳、科斯马、马尔塞林和梅南德著作中有关波斯的段落作了辑录和译注。原书的第四编即本书的第三编为《丝绸之路和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作者主要是介绍了中国的谷子、高粱、樟脑、桂皮、姜黄、生姜、水稻、麝香和大黄的栽培史、用途以及经波斯传向西方的过程。大家在阅读过程中一定会为书中丰富的资料及具有探讨性的观点所吸引,同时也会看到作者给予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的高度评价和赞赏。法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与译者谈到本书时,称玛扎海里先生为“具有中国热的学者”,这是颇有道理的。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于1983年在巴黎出版之后,我们在很长时间只见到国外的书评和广告而未见原书。1985年春,法兰西学院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来华访问期间,与我谈到了此书,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谢和耐先生回国后热情地购买了此书并寄给了我。后来,我又通过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布尔努瓦(L. Boulnois)教授而与玛扎海里先生建立了通讯关系。我提出想把该书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以加强中法两国学者的学术合作。玛扎海里先生获悉后非常高兴,于1986年6月15日来信,

正式表示他已同意无偿向中国转让版权,允许中国翻译出版其书,仅仅希望在出版后能送他几本样书作为纪念。玛扎海里先生还应译者的要求,在百忙之中为本书的中译本写了一篇序言。他还将其书的勘误表及地图寄给了译者,并要求中译本为这本《丝绸之路》加一个副标题《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1986年8—9月,译者在巴黎期间,阿里玛扎海里先生及其侄子皮埃·玛扎海里(Pierre Mazahéri)先生多次招待我。玛扎海里先生反复谈到,西方古代、中世纪,甚至是近代文明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而追溯到波斯,进而从波斯追溯到中国。在14—15世纪之前,东方是各种文化的“创造者”,而“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模拟者”。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代的东方却落伍了。他一再表示自己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希望中国能发扬其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加强与外国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互相取长补短,进一步发挥现已成为海、陆、空交通的“立体丝绸之路”的交流作用。这也是译者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不惧辛劳,不揣谫陋,把这部书译成中文时的初衷。

本书是我在1987年译完的,本打算能及早出版,将中译本回赠作者玛扎海里先生,以示谢意和对中法两国学者友好合作的真诚祝愿。但事与愿违,由于当时国内学术著作的出版遇到了困难,故此书的中译本一拖再拖而无法问世。后来,承蒙王炳华与樊锦诗两位美意,将本书列在由法国外交部资助的《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中。但正在此时,噩耗传来,本书的作者阿里·玛扎海里先生不幸于1991年11月24日去世了,享年77岁。我对于玛扎海里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记忆犹新,他虽然身材不算魁梧,但却显示出一种惊人的精明,思维敏锐,待人热诚,心胸坦荡。1986年,无论是在巴黎城内还是在夏尔特尔古堡,他谈吐不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虽然他是一名法籍伊朗血统的学者,但开口闭口总是讲“我们东方人……”,“他们西方人……”。他对东方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酷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窥见一斑。据玛扎海里先生的侄子和版权继承人彼埃·玛扎海里来信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仍惦念此书中文版的出版情况。玛扎海里先生生前就答应向译者转让版权,他侄子于1992年2月19日的来信中再次确认。现在此书的出版,也算了结了译者的一桩心事。对于本书作者阿里·玛扎海里的生平与著述情况,读者可参阅本书末所附的作者的侄子彼埃·玛扎海里应译者的要求而写的《阿里·玛扎海里小传》。1992年5月,译者又高兴地获悉,在巴黎成立了“阿里·玛扎海里师友会”,出版刊物,重版和新发表玛扎海里先生的遗作,研究他的学术成果。译者有幸被邀请成为该会的名誉会员。

本书是在多方面的帮助下才翻译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岷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家瑛先生为我解决了许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名词术语。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同志又仔细审阅译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本书避免了不少纰漏。值此书问世之际,特向他们以及法国的谢和耐、布尔努瓦、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郁白先生等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的欠妥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 昇

1992年6月1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译本序

在作为我 30 多年研究心血的这本《丝绸之路》的中译本出版之际，我谨向中国朋友们作一番“自我介绍”，以促进学术和思想的交流。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作为历史系的学生而完成了大学学业。但由于个人情趣，我便对当时被人称为“社会学”的问题产生了爱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被困于法国，远离我于 1914 年诞生的祖国伊朗。我于是便真正地体验了个人和社会的命运，而过去我对此仅有一种理性知识。

在 1938—1946 年间，我同时发现自己当时的理论和实践知识都很不足。法国解放后，我又返回了在战争期间离开而到地方上避难的巴黎，坚信应该重新独自开始自己的全部学业，与不同的民族和社会保持接触。在这一问题上，我也有幸与在巴黎同时存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各民族人员经常交往。我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工作和学习了近 10 年，与各种语言的专家们一起从事对东方手稿著作的编目工作，同时又把我剩余的时间用了搜集有关在各个民族和种族中所完成的旅行、研究和探险的著作。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把它们汇辑起来，而且还是为了阅读和从事研究。

大家可以问我在哪里作什么研究。始终是同一件事：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人类及其家庭、民族、禁忌、信仰、畏惧、希望、环境、生活方式、可能发生的事件、发展、停滞、倒退、哲学、艺术和行业的

研究。因此，我投身于对科学史的研究，几乎对所有民族的科学技术、思想和文学之起源与出处都多少作了一些研究。我在可能的情况下主要是阅读原始史料而不是论述性的文章，从而逐渐掌握了相当多的语言。

我是怎样阅读了千百种如此严肃和令人厌倦的书籍和文章呢？这是因为当时在我头脑中就已经存在着一种罗盘或星盘式的方法，使我得以思考一位作者或一种史料，正如一名法官、侦探或间谍所作的那样。我研究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见解并直接命中主题。这些观点涉及到了女子、奴婢、劳工、失败者、神父、学者等人的立场，有关财产的流通、支付手段、信贷、利息、高利贷问题，有关各个民族的具体地理、生产、消费、和平、战争以及他们各自近邻的问题。

当地资料始终都保持沉默，因为没任何一个民族和种族都不是稍晚才自我了解的，而常常是外人首先发现他们并对他们作出描述。但我们还必须对外国人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往往是肤浅的，或者是追求私利和心怀恶意的。我自己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搜集和阅读各个不带偏见的外国人之调查和记叙，以探讨他们的说法是否完全吻合。我指出了他们的时兴性看法以及他们无意之中提到的观点，同时也指出那些与他们的直接利益不相符的地方。这样的情况始终都会出现。

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在探索当地史料的交点，即使它们与外来人的描述不相吻合，但至少也不会否认而可以辅证它的材料。

我应该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在自我实践，本人就是我自己实验室中的小动物，完全如同中国古代的那些以小剂量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有毒的或被认为是有毒的药品以便对它们作出评价和获得

个人对此的直接认识的医生们一样。这是为什么呢？作为伊朗人，我直接或通过资料而了解我的祖国，同时我也阅读不同外国人对它所作的或正在作的描述，对两种观点进行对照比较，这样一来就获得了一种半透明的形象：一方面是一个社会对本身和其它社会形成的形象，另一方面是其他人对这个社会及自己形成的印象。这就如同一个人在其车辆奔驰时的态度，他在注视自己前面道路的同时又在其反光镜中看到了其它企图超车的车辆之运行。

所以，我从一开始起就由于习惯而成为一个辩证社会学家，同时也由多学科的社会学家开始而超越了“弗洛伊德派学者”。我既无爱又无恨之偏见，完全如同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面对其试验台、一名收藏家面对其搜集品一样，我同样也非常钟爱自己所研究的所有“臣民”、“国家”和“民族”，把他们各自纳入其自然背景中进行研究并真心诚意地对他们怀有好感。我如同宙斯神一般自其天空居高临下地观察一切，怀着一种风景摄影师那样的愉快心情而珍爱一生中所拍摄的风景照片并向往着其未来的预展。

所以，我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同样也在许多地区多次从事旅行考察，在此之后发现真正的历史学家都应像“医生”一样，历史学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的医学，人民会使人联想到气质、社会是由限定的器官和具有感觉能力的肢体组成的，这些有机社会经历过健康、疾病和康复等阶段。

我已指出自己根据精明的逻辑学家的作法而按“气质”对社会分类，或者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按“家族”分类。但因为我在开始时就选择了研究我自己的民族——波斯这种会令人精疲力竭的任务。我之所以称之为“令人精疲力竭的”，那是因为要自我了解则是非常困难的。我发现如果在世界上确实有一个社会可以与波斯相比较的话，那末这个社会就只能是中国。我当然也没有忘记使中国

人有别于波斯人的许多差异。这是一个具有独自特点、特殊的心理和特殊景色的国家。在波斯与其它具有远近不同的亲缘关系的文化之间,唯有中国文化才会使我联想到今天在伊斯兰文化掩饰下的伊朗文化的实质。

数年以来,西方的“外国人”都从把伊朗乔装成伊斯兰文化的作法中找到了他们那新民族主义的利益,这是荒谬绝伦的。正如中国远不是一个佛教国家一样,波斯也远不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因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地区(即那一片非常干旱或荒凉的辽阔地区,它在数千年来把波斯与希腊-罗马社会分隔开了)所持有的一种神秘哲学现象。伊斯兰教是一种“走私”的产物,那种认为波斯全部或部分为伊斯兰国家的看法都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学的错误、一种科学的错误。难道欧洲或美洲由于在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而信仰基督教便被归溯于以色列吗?在这些令人看到诞生了希腊哲学家和罗马天才人物的古代社会中是否会有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呢?在中国,难道仅仅是由于佛教教派于某一时代在那里进行了征服而就有婆罗门教徒或印度教徒吗?

如果从远方看去的波斯可以与阿拉伯的暗淡阴沉色彩相混淆,这也是无论在阿拉伯还是波斯这两个民族中没有一个是可以于此发生错觉的民族。那些西方和东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们正在进行或部分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一部分人乔装成“伊斯兰教徒”,另一部分则乔装成“阿拉伯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自欺欺人。帝国主义者们的较量就如同两个醉鬼用酒瓶子和椅子斗殴一样,他们称这些可怜鬼们为“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世俗人对此毫不理解。

波斯人从来不曾是宗教狂。狂热盲信并非伊朗人的特征,完全如同它也不是中国人的特征一样。波斯人完全如同中国人,其天

性就是怀疑宗教信条。这是一个宽厚的民族,正如它那带有什叶派之深深烙印的艺术和文学所证明的那样,这种信仰始终坚信,神祇既不存在于清真寺,也不存在于犹太教礼拜堂、教堂和佛塔之中,始终暗示祈祷、朝圣……和圣战都不会得到任何实际的东西。

原教旨主义是在一个世纪之前由以色列人臆造的,这批以色列人分散在全世界,但一直希望在政治上重新集聚以创建一个犹太国。英国人把原教旨主义运用于印度,以便把该国分裂成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两大部分。他们为了这样作而在夜间偷偷地把一头牛的尸体抛入了一座印度教寺院,或者是把一只猪的尸体投入一座清真寺中,以便点燃内战的烈火。英国人在离开印度之前把它分裂成两半。他们的“工事”尚未拆除。原教旨主义在一个世纪以来就先在美洲,后在欧洲由复国主义的领袖们向由人为制造的以色列人灌输,他们保护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部族中间创建的一个完全是犹太人的国家。由此而产生了一种难以解决的局势。他们以传染的方法而将其中世纪的“原教旨主义”一词向波斯和阿富汗输出,尚且不谈向非洲输出的事。

然而,任何社会学家都对其科学有着清醒的认识,清楚地看到了这是一种流行病、一种传染得越来越近的霍乱症。这种原教旨主义如同瘟疫一般,不应将它与我在本著作《丝绸之路》中讲到的“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相混淆,这在我的另一部著作《中世纪穆斯林们的日常生活》一书的情况中也如此。因为在10—15世纪期间,它是指一种自然文化,一种健康状态。这种情况与现在正猛烈发展的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不同。这种原教旨主义就如同一场细菌战,由武器商和混水摸鱼者们发起。新殖民主义者认为战争状态、人为创造的悲剧、连绵不断的战争将维持原教旨主义、军火交易和掠夺帝国的残余势力,阻止人民在2000年前夕的觉醒和进步。

但我们将注意向他们证明这些人在其阴险的打算中荒谬到了何种程度,这种打算就如他们在上个世纪组织鸦片交易以削弱和统治东方民族一样。

为了向中国朋友们提供些有益资料,我再来论述自己的主题:在波斯和中国两种文化之间具有选择性的相似性。我们掌握有成千上万的证据和资料能说明在这二者之间存在有相似性。北京的同事们可能会对我的讲法感到惊愕,因为他们可能由于阅读来自英美的著作而在思想中将波斯与“伊斯兰世界”相混淆了。这是一种非常不正确的观点。波斯与所谓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差异就如同中国与“佛教世界”的差异一样。伊朗人与“阿拉伯人”相差之远如同中国人与“越南人”一样。中国人首先是一种古老文化的代表,与其周边的“蒙昧民族”有别。波斯人的情况完全如此。

在波斯有一些公元前第4个千年纪时的占地面积很大的古墓葬。这就是说伊朗人已经具有6000年的历史了,伊朗四周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与之相媲美。面对地中海海盗民族的波斯人完全如同16—20世纪面对进攻中央帝国的“西方海盗”的中国人一样。与突然间从其沙漠深处涌现出来并入侵伊朗的游牧阿拉伯人相比,伊朗人也完全如同面对匈奴人和蒙古人的中国中原人一样。

“阿拉伯人”(实际上只不过是贝督因人)在波斯和在与波斯文化接触中变成了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穆斯林教徒。同样,蒙古人忽必烈在13世纪时也乔装成“天子”,而不想以“匈奴人”自居。同样,在公元800年,“穆斯林们的哈里发”河伦(Haroun el-Rashid, 786—809年)在致信“法兰克人的国王”夏勒马涅时署名为“波斯王河伦”。他赠送给该国王的礼品都是波斯产物。穆罕默德(贝督因人的首领)之继承人不愿意自称为“阿拉伯人”。此外,哈里发们都操波斯语并令人把一些波斯文教科书翻译成贝督因文。他们也欢度